审签：王峻岭 张靖瑜 编辑：牧兰 美编：王敏

蒙古马精神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奏

——评《查干阿都与锡林郭勒草原的故事》的童话叙事与时代价值

●孙雨轩

当锡林郭勒草原的第一缕晨光刺破天际，一匹名叫“查干阿都”的幼小蒙古马便踏着露珠开启了它的成长史诗。孙永斌先生的长篇儿童小说《查干阿都与锡林郭勒草原的故事》，以这匹小马的视角为核心，编织了一幅融合壮美草原风光、万物有灵童话、深厚民族精神与鲜明时代价值的瑰丽画卷。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充满童趣的草原动物传奇，更是一部以童心为笔、以草原为纸，深刻书写蒙古马精神内核，并在童话般万物对话的和谐图景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力作。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时代思考，为新时代儿童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核心价值提供了典范。

童话王国的艺术构建：万物有灵的诗意对话与草原生命的交响

小说的艺术魅力首先根植于其对锡林郭勒草原进行的一场彻底的“童话化”重构。作者孙永斌赋予草原万物以鲜活的生命与灵动的语言，构建了一个生机勃勃、充满诗意的童话王国。

主角位移与视角革新：幼马查干阿都的“心灵之窗”。突破传统儿童小说常以人类儿童为主角的模式，将一匹幼小的蒙古马——查干阿都置于叙事的绝对中心。这一匠心独具的设定，带来了叙事视角的革命性转变。读者透过查干阿都那双清澈懵懂又充满好奇的马眼，去观察、感知和理解整个草原世界。它初次站立时的踉跄，对奔跑的渴望，对牧人“阿爸”的依恋，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与探索，无不以最本真、最贴近儿童心理的方式呈现。这种非人类主角的“陌生化”视角，既充满童趣的新鲜感，又因其生命体验的共同性（成长、勇气、亲情、友谊）而极易引发小读者的强烈共鸣。查干阿都不再是背景或工具，而是拥有独立灵魂和成长轨迹的故事发动机和情感核心。

万物有灵的诗意对话：草原生命的和谐共鸣。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色，是赋予锡林郭勒草原上每一片土地、每一株花草、每一种动物以“说话”的能力和独特个性：一是聆听地域的私语。乌珠穆沁草原丰美的牧草会自豪地低语：“看啊，是我滋养了最健壮的牛羊！”浑善达克沙地的沙柳则在风沙中坚韧地歌唱：“根扎得深，就不怕风狂！”每一片草原、沙地、湖泊、山丘，都成为有情感、有故事的角色，共同诉说着锡林郭勒大地的壮阔与多样。二是风流转了花草的密语。金莲花在阳光下灿烂欢笑，萨日朗（山丹花）热情似火地打招呼，洁白的芍药花则像温柔的姐姐，安慰着迷路的小查干阿都。它们不仅是风景的点缀，更是情感的传递者和成长的见证者。三是呈现动物的交响。草原鼠机灵地传递消息，百灵鸟用歌声预报天气，忠诚的牧羊犬是可靠的伙伴，甚至狡猾的草原狼也有其生存的逻辑和对“对手”的某种“尊重”。所有的生命都在同一个生态舞台上，遵循着自然的法则，进行着或和谐、或竞争、但最终归于平衡的对话。查干阿都与它们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对草原生命共同体的生动诠释。这些充满童趣和想象力的对话，将抽象的自然法则和生态智慧转化为儿童可感可知的童话语言，在孩子们心中播下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种子。

童话叙事与民族风情的交融：民俗的诗性表达。作者巧妙地将蒙古族独特的文化符号和民俗活动融入童话叙事。那达慕大会上，马蹄声被形容为“大地的心跳”，搏克（摔跤）选手的力量之美被拟人化为“山峦的舞蹈”，悠扬的长调则被描绘成“风与云的对话”。敖包祭祀的庄严，蒙古包升起的炊烟，迁徙转场的壮观，都在万物有灵的视角下，褪去了神秘的外衣，呈现出一种充满诗意和亲切感的童话色彩。这种交融，使民族文化的传递不再生硬，而是在童话的梦幻氛围中自然流淌，浸润童心。

蒙古马精神的具象化颂歌：幼马成长与不屈灵魂的淬炼

小说将抽象崇高的“蒙古马精神”——“勇往直前，不畏艰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完美地具象化于主角查干阿都的成长历程中，使其成为一部感人至深的“精神成长小说”。

“不畏艰险，勇于面对困难”的核心叙事动力。查干阿都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不断挑战困难、超越自我的奋斗史。从它降生时挣扎着第一次站立，到学习奔跑时无数次跌倒又爬起；从初次面对暴风雪的惊恐无助，到最终能在风雪中为牧人引路；从遭遇狼群的生死考验，到学会用智慧和勇气保护羊群……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淬炼。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这些极端困境，尤其突出查干阿都在身体极限与心理恐惧双重压力下的表现。这种在绝境中迸发的勇气和坚韧，正是蒙古马精神最震撼人心的体现。

“忠诚使命”的深刻烙印。忠诚，是蒙古马精神融入血脉的基因。查干阿都从小被牧人家庭养育，它将对“阿爸”（牧人）的深厚情感，升华为对守护家园的神圣职责。这种忠诚不是盲从，而是基于深厚情感认同和生命共同体的自觉担当。它理解自己作为蒙古马的价值和使命，并甘愿为此付出一切。小说结尾，当查干阿都成长为健壮的骏马，依然坚定地守护着草原和牧人，正是这种忠诚精神的永恒写照。

“甘于奉献”的生命底色。蒙古马的奉献精神，在查干阿都身上体现为一种无言的、不求回报的付出。长途跋涉不叫苦，负重前行不抱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它的价值在于行动本身，在于对群体（牧人家庭、羊群、草原生态）的默默贡献。这种奉献，在童话的语境中，闪耀着纯粹而崇高的光芒。通过查干阿都这一鲜活立体的幼马形象，小说将蒙古马精神从历史传说和抽象概念中解放出来，转化为一个可亲、可感、可学、可敬的生命榜样，在儿童读者心中树立起一座关于勇气、坚韧、忠诚与奉献的精神丰碑。

万物共生与命运交织：童话图景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小说超越单一物种或单一民族的叙事，在查干阿都的视角下，构建了一个万物共生、命运交织的草原世界。这一童话图景，成为自然隐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绝佳载体。

草原，共同的家园与命运的纽带。锡林郭勒草原，是查干阿都、牧人、各种动植物共同的家园。这片土地滋养着所有生命，也连接着所有生命的命运。风调雨顺，则万物欣荣；暴雪干旱，则众生艰难。在故事发生场域与情节角色变化中将故事推进，以寻找哥哥查干扎那作为查干阿都目标。一路上，它欣赏过流连忘返的美景、遭遇过命悬一线的险境，遇见需要用善良帮助的鼹鼠、乌鸦，用友情合作的伊和努德，用勇气战胜的草原雕、草原狼，用智慧辨别的假朋友——狐狸。小说通过草原生态的整体性描绘，以及查干阿都感知到的万物互联（如花草的警示、鸟类的预报、动物间的互助），生动地阐释了“共同体”最本质的含义：共享一片天地，共担风雨，休戚与共。这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运与共提供了自然维度的深刻启示。

牧人家庭，多民族共同体的微型缩影。养育查干阿都的牧人家庭，是小说中人类社会的代表。作者并未刻意强调其单一民族属性，而是着重描绘其包容、勤劳、智慧、仁爱的品格。牧人“阿爸”对查干阿都的慈爱与严格，对草原规律的尊重，对其他民族朋友的真诚友善，都体现了一种超越单一族群的、基于共同生活和人性美好的情感联结。查干阿都对这个家庭的深厚感情和忠诚守护，象征着不同生命形态（在此隐喻不同民族）在同一片土地、同一份情感滋养下形成的牢不可破的纽带。书中描写牧人一家与来访的汉族农业专家共同研究抗旱牧草、与回族商人公平诚信交易的情节，虽着墨不多，却在查干阿都纯真的观察中，展现了草原上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日常。

“对话”的本质理解、尊重与互助。小说中万物之间充满童趣的“对话”，其深层意义在于沟通、理解与互助。查干阿都通过倾听花草的“低语”避开危险，通过与百灵鸟“交谈”预知天气，在遭遇困境时得到其他动物（如经验丰富的老马、勇敢的牧羊犬）的提醒和帮助。这种跨越物种的沟通与协作，正是构建和谐共同体的基础。它隐喻着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只有通过真诚的交往、深入的理解、相互的尊重和及时的援助，才能应对共同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查干阿都最终成长为草原的守护者，其力量不仅源于自身的蒙古马精神，也源于它对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理解和它所能凝聚的“共同体”的力量。

深刻的时代价值：童心沃土中的精神传承与共同体认同

《查干阿都与锡林郭勒草原的故事》在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中具有多重显著的时代价值。在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中，《查干阿都与锡林郭勒草原的故事》提供了承载与传达重大时代主题的典范路径。在童趣盎然的故事中融入严肃价值；它超越单一民族叙事，在多元互动中展现共同体图景；它巧妙运用童话诗性，使蒙古马精神等抽象品质变得可亲可感。书中描写草原那达慕大会的场景便集中体现了这种艺术匠心：赛马的激烈、摔跤的力量、儿童的笑语、不同民族观众的喝彩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和谐的草原生活画卷。为新时代儿童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核心价值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艺术方案。

传承与弘扬民族精神的创新路径。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中，如何让下一代理解和传承如“蒙古马精神”这样的优秀民族品格？小说给出了答案：摒弃枯燥说教，回归儿童本位，以充满童趣和想象力的童话叙事，将精神内核具象化于一个可爱、可敬的动物主角的成长故事中。这种创新路径，使抽象的精神变得可触摸、可效仿，极大地增强了其在儿童心中的感染力和生命力。《查干阿都与锡林郭勒草原的故事》以其童话般纯净的对话表达、对蒙古马精神的生动诠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然融入，构建了一座从童心通向民族文化深层的艺术桥梁。当查干阿都与“白云”的身影消失在草原天际线时，他们留下的不仅是动人的故事，更是一种精神的回响——那坚韧不拔、忠诚勇毅的蒙古马精神，那像草原一样广阔深厚的共同体意识，正在新一代少年心中悄然生长。

生态意识与生命教育的诗意启蒙。在叙事手法上，小说创造性地构建了儿童作为“文化转译人”的角色功能。查干阿都既是草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向读者传递这一文化的桥梁。作者借查干阿都之口，将蒙古族谚语、习俗、自然知识以儿童能理解的方式娓娓道来。

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色在于其童话般纯净、充满诗意与童趣的对话表达。作者赋予草原生灵以语言能力与情感思维，营造出万物有灵的神奇世界。通过构建万物有灵、和谐对话的草原童话王国，小说在儿童心中潜移默化地植入了深刻的生态伦理观：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理解万物互联。这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生态危机的一种文学回应，也是对下一代进行生命教育和可持续发展观启蒙的生动教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童年版叙事。当锡林郭勒草原在清晨的薄雾中苏醒，查干阿都——那匹纯真勇敢的蒙古马的身影便跃然纸上，开启了一场融合诗意童话与深沉民族精神的草原之旅。长篇儿童小说《查干阿都与锡林郭勒草原的故事》不仅是一部描绘草原风情的作品，更是一部深刻书写蒙古马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童话般对话为艺术特色的文化叙事佳作。这部作品犹如草原上架起的一道彩虹，一端连接着传统与现代，另一端则伸向儿童心灵深处，以独特的艺术手法为新时代民族精神与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充满温度与诗意的表达。小说将宏大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巧妙地融解于草原万物共生共荣的童话图景和查干阿都视角下在草原成长的生活点滴中。它通过“共同家园”“命运相连”“沟通理解”、“互助共生”这些儿童易于理解的童话逻辑和情感体验，自然而然地传递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核心价值，为在青少年群体中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充满温度与诗意的文学载体。这种以童心诠释文化的方式，既避免了生硬灌输，又使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在儿童认知层面获得有效传递。

困境中淬炼品格的成长启示。小说艺术殿堂的另一根支柱，是对“蒙古马精神”深刻而动态的叙事呈现。这种精神绝非抽象符号，而是通过查干阿都的成长经历被具象化为“坚韧”“忠诚”“勇毅”的鲜活品质。尤为珍贵的是，小说将蒙古马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大主题进行了有机融合与创新表达。故事中，查干阿都挣脱驯马场的束缚，开始了自己的游历。在成长过程中，它经历了与伊和努德的结伴同行、参加赛马比赛、与狼的斗争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些情节绝非刻意说教，而是在草原生活的自然脉动中，在儿童纯真的交往互动里，展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图景。小说通过儿童视角，将宏大的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日常实践，在孩子们心中悄然埋下民族团结的种子。在物质相对丰裕但精神挑战增多的当代，查干阿都面对重重困难所展现出的“不畏艰险、勇于面对”的精神，为儿童读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鼓舞和榜样力量。它启示孩子们，成长的道路必然伴随挑战，真正的力量源于内心的坚韧和在困境中淬炼的品格。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

艺苑在线

北疆文化生命力的交响绽放

——李世相《乌力格尔叙事曲》中的文化基因与艺术突破

●塔林托娅

在当代四胡创作的壮阔版图中，李世相的四胡协奏曲《乌力格尔叙事曲》犹如镶嵌在北疆艺术天幕上的璀璨星辰。这部1990年诞生的杰作，不仅以“世界首部四胡协奏曲”的身份填补了艺术空白，更以深邃的北疆文化底蕴为根基，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淬炼出新的艺术形态，为四胡创作的创新发展开辟了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路径。三十余年间，其艺术价值如草原深处的溪流般持续滋养着北疆音乐土壤，影响力早已超越地域边界，成为彰显北疆文化生命力的标志性作品。

北疆文化基因的当代解码：从叙事传统到音乐重构

《乌力格尔叙事曲》的艺术灵魂，深植于北疆大地特有的文化肌理之中。作为蒙古族说唱艺术“乌力格尔”的音乐转译，作品不仅是对一种艺术形式的致敬，更是对“以歌传史、以乐叙事”文化传统的创造性激活。作曲家从乌力格尔开篇调中提炼的“开篇动机”，犹如一根串联起北疆文化记忆的银线——其旋律中既蕴含着草原长调的辽阔苍凉，又暗藏着马头琴叙事的深沉婉转，那些起伏的音型仿佛是牧民在篝火旁讲述史诗时的语调转折，将北疆文化特有的叙事智慧与情感表达方式融入音乐血脉。

在结构处理上，作品采用的“连缀体”形式与北疆文化中“套曲叙事”的传统一脉相承。正如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以章节连缀构建宏大叙事，《乌力格尔叙事曲》的各个段落亦如草原上的蒙古包群落，既独立成景又相互呼应：时而展示草原的舒展开阔，时而流露山林的深邃神秘，最终在“开篇动机”的贯穿下，凝聚成一幅立体的北疆文化画卷。这种结构思维并非简单的形式借鉴，而是对北疆音乐的诠释——在看似自由的段落连缀中，始终保持着对文化精神内核的坚守。

调性安排上，作品对四胡传统定弦的尊重，实则暗含着对祖国北疆自然声学环境的呼应。四胡特有的音域与音色，恰能模拟北疆大地的声音记忆：低音区如草原长风掠过旷野，中音区似牧民吟唱回荡山谷，高音区若雄鹰啼鸣划破苍穹。作曲家让现代创作技法臣服于这种自然赋予的声音特质，使作品的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北疆文化的泥土的芬芳与草原的气息。

北疆器乐语言的边界突破：技术创新中的文化表达

作为展现四胡创作艺术高度的标杆之作，《乌力格尔叙事曲》在演奏技术上的突破，本质上是对北疆音乐表现力的极限拓展。那些创新性运用的双音演奏、单音与双空弦快速交替等技法，绝非单纯的技术炫技，而是对祖国北疆自然与生活声响的音乐化再现：双音的厚重感让人想起风雪中牧民合唱的呼麦声，快速音型的交替仿佛是马蹄踏过雪原的急促节奏，而偶尔出现的泛音则恰似星光在湖面的细碎闪烁。这些技法的运用，使四胡这件源于民间的乐器，第一次拥有了表达复杂情感与宏大叙事的能力。

这种技术突破对演奏者的挑战，实则是对北疆音乐传承者的时代考验。从1991年首届内蒙古交响乐比赛中演奏家们对作品的初次诠释，到2006年在八省区四胡大赛中摘得桂冠的精彩演绎，一代代四胡演奏者在这部作品中完成着技艺的传承与超越。他们的指尖不仅在琴弦上舞动，更在续写着北疆文化与乐器共生的历史——当四胡的弓弦摩擦出前所未有的音色时，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演奏技术的进步，更是北疆文化在当代语境中自我更新的声音。正是这种挑战与突破，让四胡从草原毡房里的伴奏乐器，成长为能够对话世界的北疆文化使者。

北疆文化的现代交响：传统与创新的辩证共生

在作曲技法的创新中，《乌力格尔叙事曲》始终保持着对北疆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作品中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从未脱离北疆文化的精神内核：乐队编制中加入的人声调性片段，并非简单的音色实验，那些若隐若现的人声线条，恰似草原上远方传来的牧歌，与四胡的旋律形成呼应，再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存哲学。而多层次的音响空间营造，则暗合了祖国北疆大地的空间特质——从草原的平面铺展到山林的立体环绕，音乐织体的变化始终呼应着地理环境的独特韵律。

这种“适度创新”的智慧，恰恰体现了北疆文化“兼容并蓄”的生存智慧。作品既没有因固守传统而陷入文化封闭，也没有因追求现代而沦为西方技法的附庸，而是如草原上的“那达慕”盛会般，让不同的艺术元素在平等对话中绽放光彩。当四胡的独奏线条与交响乐队的织体交织时，我们看到的是北疆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的自信表达——它证明了传统的现代化不是对过去的背离，而是让文化基因在新的土壤中开出更绚丽的花朵。

从1991年连获表演与作品一等奖，到1995年斩获内蒙古文艺最高奖萨日纳奖，再到成为北疆文化对外交流的经典曲目，《乌力格尔叙事曲》的成功，本质上是北疆文化生命力的艺术证明。这部作品告诉我们：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动的江河；创新不是无根的漂泊，而是带着文化基因的远航。三十余年来，当四胡的旋律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响起，那既是乌力格尔古老叙事的当代回响，更是北疆文化以音乐为语言，向世界发出的深情告白——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传统与现代始终在交响中绽放着不朽的魅力。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乐团二级演奏员）

AI创作的突围之思

●常耀宗

名家观点

不久前，笔者在《光明日报》读到作家王跃文的《救救AI》一文，大有眼明心亮之感，文章虽短但意颇深，令人不由生出些许感想。

文章先从回答《家山》书名由来入笔，接着以古人作诗词不重题目为引子，巧妙地带出内容重于形式这一文学创作核心命题。王跃文的这番话，言外之意是，相对于文学作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言传就没有了意思更没有了气势，任何时候都是“留白”的好，正所谓“重在体验”。事实上，从古至今的无题诗是诗人匠心独运的艺术创造，它以含蓄委婉的笔触为读者打开了想象的大门，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悟到意在言外的深邃艺术妙境。

文章接着指出，当下，不少文章为吸引关注，用华丽对仗的标题哗众取宠，内容却空洞媚俗，既无个性可言，又缺创新意识，致使浮夸文风泛滥。这种华而不实的风气，既违背了老祖宗含蓄的为文传统，又悄然浸染到人工智能领域。如今，AI生成的内容大都空洞无物，这正是受人类不良文风影响的明证。为此，王跃文疾呼：“救救AI！”这既是对人工智能创作困境的深刻反思，也彰显出作家重塑文风的使命担当。

救救AI真的是救救AI吗？追根溯源，AI的创造者是人类。由此不难理解，AI生成的内容带有浮夸、虚浮风，本质上源于人类审美价值取向的偏差。在流量至上的时潮中，人类的偏好和追捧间接驱动着AI迎合特定受众需求。当我们批判AI生成的标题有些“高大上”、文章充斥谄媚虚浮的同质化表达时，或许还未意识到，这些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浮躁功利的心态导致的。

人类发明AI，本意是希望借助科技力量提高自身效率、拓展创作边界。可如今，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被自己创造的工具异化，这都是因为人类过于依赖AI，仅仅满足于表面的华丽与浮夸，而忽视了有价值、含义深的创作与思考。长此以往，人们获取到的有效信息将会越来越少，思维也会变得越来越死板，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和文化创造力下降。因此，拯救AI迫在眉睫。

救救AI，其实救的是我们人类自己。所以，从我做起方可实现与AI协同进步。一方面，我们应重新审视人与科技的关系，在享受AI便利的同时，坚守以人文价值为核心的创作本质，恪守职业操守与道德底线，避免被技术表象误导。另一方面，创作者要摒弃浮躁心态和博眼球套路，注重内容的真实性、深度与创造性。通过产出优质原创作品为AI提供可靠样本，推动人与AI形成良性共生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要警惕科技对人类思维的负面影响，守住独立思考与创作能力。在训练AI中，要用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严谨学术著作等优质内容作素材，剔除不良文风数据。这样才能让AI生成真实且有创意的内容，养成正确、有价值的表达习惯，使它真正成为辅助人类创作、推动文明发展的得力工具，而不是限制思维的枷锁。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AI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既不被AI主导创作方向，又能合理运用其优势，从而让文学创作以及其他创造性活动始终充满活力，保持独特风格，产出真正有内涵、有价值的作品。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